

我心中的清华抗战英雄

► 姚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 9 月 3 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此后又公布了若干批次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不乏清华人。确实，有众多的清华学长在这场伟大的抗战中做出了奋斗甚至奉献了生命，值得我们缅怀和铭记。



**杨光注：
临难不苟、血洒异域**

杨光注 1900 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吴兴。1920 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国际公法博士学位，1927 年回国在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1930 年，杨光注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1935 年出任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总经理和总编辑，曾以“中国的持久力量”为题撰文，表达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8 年底杨光注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任职期间他宣传抗日，四处演讲，募集捐款，为国内筹集募捐了 1200 万菲币和大量物资，其中有一部分辗转运到延安和八路军后方基地，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赢得广大海外华侨的尊敬。他还帮助在菲华侨成立“华侨青年战时服务团”，进行军事作战、驾驶技术及战地救护方面的培训，先后组织四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40 年 8 月，杨光注推动菲岛华侨组织特种委员会，在马尼拉举办抗战画展，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宣传中国英勇抗战，为中国抗战争取到更多国际支持和

姚坚，1980 年至 1988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获学士及硕士学位，2010 级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原副主任，此前曾担任商务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等。



援助。

1941 年 12 月 7 日凌晨日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又大举进犯东南亚，马尼拉陷入日军包围之中，各国外交官纷纷撤离。1942 年 1 月马尼拉沦陷，杨光注等 8 名中国外交人员放弃了安全撤离到澳大利亚的机会，表示“我要领导整个菲律宾的中国人，我不能走”。他们留在马尼拉做各种应变的准备，组织了战时服务队，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其他重要文件，尽忠职守。

日本宪兵悍然逮捕杨光注等 8 名外交官，胁迫他们接受三个条件：通电重庆政府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在三个月内为日军募集 2400 万菲币，否则就没收所有华侨的财产；组织华侨协会和日军合作。杨光注作为总领事严词拒绝，被关入水牢遭受严刑折磨，百般凌辱，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4 月 17 日，日军将杨光注等人秘密杀害于马尼拉华侨义山。这是一起历史上罕见的集体枪杀外交人员惨案，一时震惊了东南亚及世界。杨光注遇害时年仅 42 岁，他坚守民族大义，以鲜血谱写了一首以身殉国的慷慨悲歌。

抗战胜利后，1947年7月7日，杨光注等八烈士的忠骸和驻北婆罗洲山打根卓还来领事的忠骸由专机运回南京，旅菲华侨万余人在机场洒泪相送。同年9月3日，九烈士忠骸安葬于南京安德门外菊花台烈士陵园。1948年，旅菲侨胞为纪念杨光注烈士，在菲律宾华侨义山建立了镌有“效忠成志”大字的纪念碑，1950年6月1日，马尼拉光注纪念学校



杨光注



九位烈士安葬在菊花台的墓园

建立。1989年杨光注等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南京菊花台公园修复烈士墓和烈士纪念馆。同年9月28日，清华大学隆重举行了清华英烈纪念碑揭幕典礼，杨光注是首批23位清华英烈之一。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杨光注被尊为烈士，他的女儿杨雪兰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5年8月24日，国家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在著名抗日英雄群体——抗日外交九烈士中，杨光注名列其中。



梅汝璈：“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梅汝璈，1904年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曾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等，表达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清华毕业后，他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曾与施滉、冀朝鼎等清华同学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毕业回国后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梅汝璈在强调“法

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办学有关，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中国指派时年42岁、熟悉英美法的梅汝璈为中国法官，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之一。1946年3月，梅汝璈博士受命挺身而出离开上海，媒体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在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曾创立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院并任院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



梅汝璈（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情景（下）

不作，军民伤亡在3500万人以上，无数前辈先烈牺牲在战场上，对日本的这笔血债必须得以清算，梅汝璈作为四万万中国人的代表，背负着祖国人民的血海深仇前往东京，为中国打赢了二战最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48年底，梅汝璈和来自其

他国家的同行们一起尽心竭力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国际审判任务。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除两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璈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统一书写判决书，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部分，中国人民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

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面对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长达十余万字的判决书章节，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6月，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从日本东京前往香港，一到港岛就立即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随之通过新闻界公开表达投向光明的心声。在中共方面工作人员安排下，梅汝璈于1949年12月乘船北上，不久安全抵达北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在梅汝璈出席成立大会时，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如今，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在南昌市青云谱区有一处明清古韵犹存的村落——朱姑桥梅村，“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梅汝璈的故居便坐落在此，故居中有东京审判纪事、梅汝璈与东京审判史料室等七个展厅，陈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书稿原本，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的40余件工作和生活用品等。

据梅汝璈家人回忆，其思想和行为带着明显的清华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穷达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全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

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梅先生本人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他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选择。受了清华的教育，就意味着对国家、民族应当有什么样的担当已无需选择。即使在他当了“右派”的日子里，在他从清华毕业已经近40年的岁月中，那不由自主吟唱出来的“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清华校歌，一直都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旋律。

2004年4月24日校庆期间，清华法学院明理楼举行了“梅汝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返校校友以及法学院师生代表共同追忆梅汝璈的凛然风骨和他那“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以及他对中国法学的杰出贡献。201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表彰称号，梅汝璈作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之一，被评为全国“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如今，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楼层墙壁上，依然悬挂着梅汝璈学长等多位清华法学前辈的画像，设置有“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的教席，让清华法学的文脉接续传承。



沈崇海，1911年出生于江苏江宁，1928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他刻苦勤奋，不仅课程成绩优秀，而且还十分热爱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队、棒球队队员，多次参加全国性的运动会。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血气方刚的沈崇海组织大学生义勇军，和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7月，沈崇海从清华毕业，他决心报考航校，驾驶战机与敌人战斗，后投考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

毕业后留校任飞行教官，后调任空军中尉分队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8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大型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炮艇等30多艘集聚在上



沈崇海

海吴淞口。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强行登陆，淞沪会战爆发。沈崇海所在第二大队奉命出击，曾投弹引爆日军弹药，并重创敌舰数艘。8月19日，他与战友陈锡纯一同驾机随队出击，返航时弹药用尽，遂驾机开足马力，冲向敌舰“出云”号，重创敌舰，二人以身殉国。沈崇海殉国时年仅26岁，后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抗日空军烈士陵园里。为表彰其英勇爱国精神，国民政府特追赠其为空军上尉。1940年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支持下，以沈崇海的英勇战绩为原型拍成了电影《长空万里》。2015年8月24日，国家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单中，1937年牺牲的空军第2航空大队9中队分队长沈崇海名列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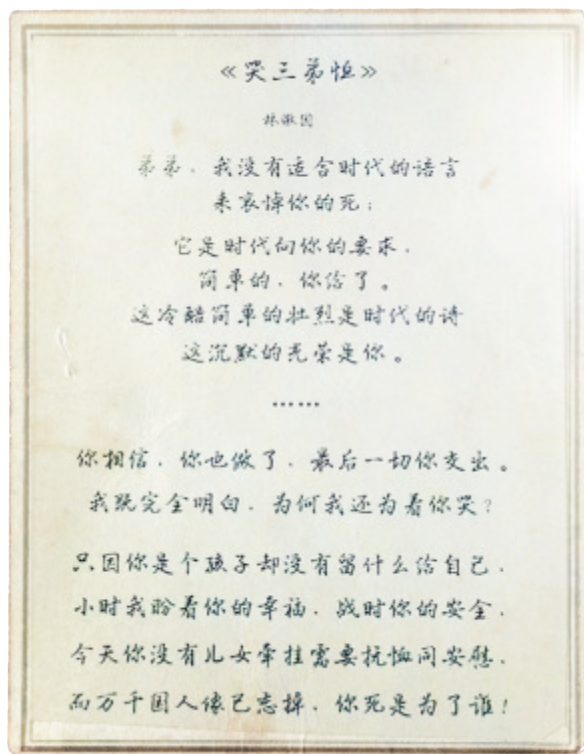
为庆祝清华百年校庆，一部反映清华学子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理想而奋斗的影片《无问西东》问世，其中有一位名叫沈光耀的优秀学生，在民族存亡之际，他毅然投笔从戎，慷慨赴死，用自己壮丽的青春人生践行了清华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理念，其原型就是抗日烈士沈崇海，他代表了在抗战中英勇献身的千万中华儿女。林徽因先生的弟弟林恒也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林恒毅然弃笔从戎，成为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在1941年成都双流机场反击日机空袭的一次空战中，林恒不顾日机的轰炸扫射，冒死登机起飞迎战。他在英勇击落一架日机后，被敌机击中坠落，壮烈殉国，年仅26岁。林徽因先生曾写过一首悼亡诗《哭三弟恒》：“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张甲洲： 为国捐躯长眠于黑土地下

张甲洲，1907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县。1923年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学校一位数学老师常给学生们讲授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1928年张甲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级。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学校地下党活动频繁。1929年夏，他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结识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冯仲云，结下了深厚友谊。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先后担任过中共清华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张甲洲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胡乔木被任命为团委书记，负责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党团工作。

“九·一八”后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参加了清华师生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之后，张甲洲开始积极奔走于北平各高校，动员黑龙江籍的大学生打回老家去，组织开展武装抗日。在事关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甲洲提出



了组建义勇军游击队进行抗日的想法。1932年4月末，张甲洲带领六名党员大学生扮成商人，由北平、天津、营口辗转回到哈尔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200多人组成的巴彦游击队宣告成立，在松花江畔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游击队成立后，上级任命张甲洲为司令，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巴彦游击队迅速壮大，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1932年8月，巴彦游击队一举攻占了巴彦县城，随后又连下几城，给哈尔滨以北地区的日寇和伪满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由于张甲洲坚决执行团结抗日、联合抗日的路线，得到了各方拥护，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此后巴彦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这支队伍高举抗日大旗，转战呼兰、绥化、兰西、安达、明水等地，给日军以重创。1933年1月，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亟需开展反日斗争的

实际，要求东北党组织与南方一样进行土地革命，破坏了业已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张甲洲率部第二次西征与其他抗日部队会合，一同攻打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途中，遭到敌人伏击，部队被打散。张甲洲并没有因此放下斗争的旗帜，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化名来到富锦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四年多，凭机智勇敢为“抗联”筹集许多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全面完成了敌后工作任务。1937年8月28日，张甲洲奉命撤离富锦前往东北抗联十一军赴任，重返疆场与敌人作殊死斗争，在途中和敌人遭遇，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0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处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张甲洲没有选择追求安逸的生活，而是回到家乡，投身于抗日事业，最终为国捐躯，长眠于黑土地。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人民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在哈尔滨建立了东北烈士纪念馆。1953年，周恩来总理专程到此悼念英烈，站在张甲洲的遗像前，他伫立良久。20多年前，就是这个年轻人对他说要回家乡组织武装抗日，往事历历在目，周总理感慨万千，不禁潸然泪下。他缓缓对着遗像三鞠躬，语带哽咽地说：“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2014年9月1日，国家公布了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1937年牺牲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师长张甲洲名列其中。如今，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巴彦县城内，有一条2000米左右长的宽敞大街——甲洲路，就是以张甲洲的名字命名的，巴彦县的烈士纪念馆、张甲洲公园、张甲洲红军小学都坐落在这条街上。与“张甲洲红军小学”隔道相望的是张甲洲公园，坐落着由胡乔木亲笔题字的张甲洲的半身铜像及纪念碑，用革命先烈的“血色足迹”，将一座城的历史与未来紧密连接。如今，“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和“清华英烈碑”



位于张甲洲公园的张甲洲半身铜像

上，都镌刻着张甲洲的名字，清华大学校史馆设有张甲洲专项展陈，常年有校史讲解队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述他的英雄故事。



熊大缜，1913年出生于上海，籍贯江西南昌，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与此后成为著名科学家的汪德熙、钱伟长、彭桓武、林家翘等为中学或大学同班同学。他还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以及网球队长、足球场的风云人物，1935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因品学兼优而留校当助教。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举校南迁，其导师叶企孙先生在迁校的过程中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因此放弃出国计划，成为叶企孙的重要助手。

“西安事变”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面临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坚决斗争，8月19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8年，熊大缜毅然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到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其时，八路军已经从各地汇聚，



熊大镇送给恩师叶企孙的照片，拍摄于1932年冬

冀中军区的队伍已经发展到20多万人，抗日力量迅速发展。但蒋介石政府只给了八路军3个师、不到4万人编制，导致冀中军区部队的武器装备、枪支弹药奇缺，战斗力大大削弱。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熊大镇动员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战，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德熙与熊大镇曾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同学，又一起考取清华大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汪德熙曾回忆说，熊大镇创办技术研究社，在研制氧化钾高级炸药时遇到难题，老师叶企孙得知后，立刻派化学系7级汪德熙到冀中协助熊大镇，此后又派物理学系技术员阎裕昌进入冀中，协助解决电控雷管的技术难关。在1938年他们用自制电控地雷炸掉日寇军用火车，那个时期冀中的弹药濒临断绝，全靠北去的大学师生研制出无烟火药，造出子弹供应抗战，得以抗击日本军队。

在熊大镇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不断壮大，竟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修理各种无线电设备和枪械的大型兵工厂，大批量制造地雷、手榴弹、子弹、掷筒弹，被广泛应用于“地雷

战”“伏击战”之中。与此同时，熊大镇还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反坦克地雷”，成功炸翻了日寇的火车车头，让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经历了战火洗礼，熊大镇也从西服革履、书卷气十足的大学生，锤炼成一身戎武之气的抗日战士。在冀中根据地，他以过人的才干和胆识，深得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赏识，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1938年底在唐县受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

1939年初，国民党将国共关系由国共合作抗日，调整为“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各个根据地发起了清查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锄奸部根据个别人对熊大镇的诬陷将他作为特务嫌疑上报，认为以熊大镇任部长的供给部是“国民党特务大本营”，将一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抓了起来，最终熊大镇不幸死于自己人的乱石之下。事件发生后，根据地的武器生产陷入停滞，日寇趁此机会对根据地大举入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吕正操等当年熊大镇的领导与战友不断呼吁，要求为熊大镇平反昭雪。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做出关于熊大镇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恢复其名誉。如今熊大镇的名字已被镌刻在“清华英烈碑”上。2015年12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抗日英烈熊大镇纪念碑揭幕仪式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纪念碑石上镌刻着熊大镇拍摄于1932年冬的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也是他送给清华恩师叶企孙先生的。石碑上刻有文字“地雷战之父，熊大镇，1913-1939”，朴实无华却又胜似千言万语，让熊大镇在此与情同父子的清华教授叶企孙先生相伴长眠。1975级清华校友袁帆有诗云：“燕赵多义士，清华出英雄；师生结

奇缘，抗敌显忠勇。蒙冤终昭雪，民心念忠魂；乾坤铭精神，日月鉴功勋！”



查良铮(穆旦):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查良铮，1918年出生于天津，笔名穆旦，祖籍浙江海宁。他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期间，以“穆旦”或“慕旦”为笔名进行写作，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哀国难》等激愤的诗行：“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2025年高考全国作文题引用了穆旦的现代诗歌《赞美》中“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句，引发全网沸腾，也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

穆旦入读清华后，正值“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1935年12月3日，清华大学全校大会通过《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的决议》，抗日爱国热情在清华园被点燃。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清华周刊》总编辑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震撼人心的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激愤痛切之言，很快传遍知识界。12月9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游行，振臂高呼“反抗华北自治，抵抗日本侵略”等口号，穆旦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开始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

1937年7月28日，敌机大举轰炸西苑二十九军大本营，清华园也无安全可言了。穆旦随清华南迁到长沙，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当时钱穆、冯友兰等教授都在这里任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学校确定继续西迁，由水陆两路入滇，穆旦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徒步经过湘西、贵州走到云南昆明，全程共历时六十八天，实际步行一千三百公里，平均日行三十二公里。这是战时中国教育史上动人心魄的“长征”。



穆旦

穆旦的现代诗歌《赞美》，写于1941年12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其时穆旦经历了跟随清华从长沙迁校昆明步行团的长途跋涉，体验了西南联大的文学灌溉，深刻感受到时代的苦难，同时也见证了人民的奋起，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于是写下了这首悲壮的《赞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他本可以安坐书斋专心学问。然而，1940年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九月下旬日军在越南登陆，昆明的局势陡然紧张。

1942年初，日军攻入缅甸，此时穆旦正值24岁的青春年华，西南联大的讲台在等着他，但为确保当时中国仅存的滇缅公路这一国际通道成为抗战中的重要任务，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日战场，以西南联大助教身份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奔赴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彰显强烈的民族大义。此后，梅贻琦校长亲自动员联大同学从军报国，一句“国家急切地需要你们”，让多少学子热泪盈眶，梅贻琦的儿

子梅祖彦也不由分说报名从军，在对日抗战中出生入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这位出身清华、作战骁勇的将军，直接向西南联大招募土木、机械、电机专业的同学加入他的部队。

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后，穆旦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血战和随后的“滇缅大撤退”。在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撤退过程中，远征军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缺衣少食，山峦难行，瘴疠横行，穆旦同样染上了致命的痢疾，还一度断粮八日。最终他凭借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在仿若人间地狱的野人山，他目睹了“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3.5万人的队伍，最终只有3000余人逃出。他曾就这段经历，写下长文《苦难的历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也曾用中国抗日军人的鲜血和泪水，写下那首凄怆痛楚而又悲壮感人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祭歌》一节写道：“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抗战胜利后在北返途中，穆旦曾在《世界晨报》发表《重访清华园》一文。此后，通过在清华任教的老同学周珏良，穆旦认识了在燕京大学读研的其妹周与良，二人先后赴美留学，于1949年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1952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穆旦怀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从1950年代起，他开始翻译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的作品，出版《普希金抒情诗集》《欧根·奥涅金》等经典译作20余本。不幸的是，1958年12月穆旦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饱受摧残。1979年，在去世两年后穆旦才得以平反，“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然而，历史并未忘记这位才华诗人。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穆旦的文学史地位逐步提高，被列为现代诗人的第一位，1980年7月，穆旦“文革”期间翻译的《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巨著。1981年，南京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穆旦过世前精心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卷本。1997年在他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纪念穆旦逝世20周年》《穆旦诗全集》等图书出版，以表示对这位受人尊敬和同情的苦难诗人的纪念。200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穆旦译文集》。2006年4月，两卷本的《穆旦诗文集》也已面世。

清华的师生也没有忘记这位前辈学长。2016年6月，一场主题为“我所得到的 不过是失去的生活”的展览，在清华图书馆北馆李文正馆展出，展览包括穆旦诗歌著作、穆旦手稿图片、穆旦个人照片等内容。2018年初，电影《无问西东》上映，电影结束之后的“彩蛋”里，出现了众多清华师生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穆旦。此时此刻，电影《无问西东》里的话在我们耳边回响——“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在参观了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光荣历史后，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10月27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友会联合主办，“首届重走西南联大”活动在长沙临时大学旧址启动，由115名三校校友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沿着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

西迁路线，用7天时间完成了1800公里的行程，抵达西南联大旧址，以此向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致敬，向当年穆旦亲历过的那场“教育长征”致敬。

2007年，时值穆旦逝世30周年，南开大学文学院为传播穆旦诗作的精神与魂魄，在文学院的内庭院为穆旦“勒石造像，以为永念”。2018年4月5日是近代爱国主义诗人穆旦诞辰一百周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南开大学文学院在当天举办了“查良铮（穆旦）先生百年诞辰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穆旦的长子曾回忆父亲往事：1973年父亲曾在新华书店购买的一本鲁迅杂文《热风》的扉页上，写下鲁迅名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恰似穆旦爱国奉献的人生写照。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原籍浙江省绍兴市，是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作品《背影》《荷塘月色》闻名遐迩。他于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5年8月，朱自清应聘担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教授，讲授《国文》《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朱自清的主持下，清华中文系沿着“创造我们的新文学”目标发展，拥有了陈寅恪、杨树达、黄节、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王力等诸多名师，形成了谨严、开阔的学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察北6县，企图集中兵

力侵占绥远，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1936年11月，朱自清等人奉教职员公会会长冯友兰之命，携带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绥远及平地泉慰劳前方抗战将士。

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还发起“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缝制寒衣。

1935年他担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为了保护清华大学的珍贵图书，朱自清先生和清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清华大学预见到局势的严峻，决定提前做好南迁准备。朱自清敏锐地意识到保护图书馆书籍的重要性，并迅速组织了早期准备与装箱。1935年11月19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在随后的两天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将馆藏中的珍贵图书装箱。这些书籍包括清华图书馆的古籍精华，如全部宋元版书、明清两代的众多古籍，共计6660种、9692函、12764册，全部被装进417个箱子中。这些书籍随后于1935年11月28日从清华园火车站装上火车，秘密南运。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交通中断。当时正值暑假，但图书馆馆员不顾敌军严密检查，将本馆及各系预装的图书仪器50余箱运至城中计划继续转运。1937年8月5日，日军占领清华园，图书馆



水木清华荷塘旁的朱自清雕像



原创舞剧《朱自清》在新清华学堂上演

内数十万册中西文图书和期刊被迫忍痛割舍。幸好在1935年已经南运了400余箱珍贵书籍，这些书籍被存放在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随后又转移到重庆。在转运过程中，图书馆职员唐贯方的故事尤为感人。唐贯方是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的后人。1938年初，他被派往汉口，负责抢运这批抗战前夕南运出的古籍。此时战火逼近武汉，学校决定将这批书转运至重庆，务必在日寇攻占汉口前抢运出来。唐贯方经多方联络，将400多个大箱子装船运送，行至宜昌遇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受阻达四个月之久。他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巡视码头，腰系钉袋、手持铁锤，逐箱检查、维修、加固，终于再次找到船只，历尽艰险将这批珍贵古籍和仪器设备全部安全运抵重庆。

在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西南联大的8年间，尽管条件艰苦，清华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图书馆保持密切合作，这批转运书籍为西南联大的师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抗战胜利后，这些书籍也成为清华复校的重要基础。朱自清作为时任图书馆馆长，不仅在转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爱国精神，更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

1939年6月9日，朱自清在昆明写下《北平沦陷那一天》一文，表达出了当年整个北平人民在战争来临时万分焦虑、忐忑不安的心情，以及对胜利的渴望，其中一句“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铿锵有力，既是对和平的期盼，也表达了对战胜日寇的必胜决心。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迁回北平，他不顾病痛与日益严峻的健康状况，全力著述，将编辑和出版《闻一多全集》视作对亡友的纪念，

对国民党政府当局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八年艰苦的流徙生涯后，朱自清仍住回清华北院旧居，生活的艰难加上精神的苦闷，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的胃病发展到胃穿孔大出血，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不幸辞世。

毛泽东曾给予朱自清高度评价：“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赞扬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冯友兰的挽联写道：“人间哀中国，破碎山河，又损伤《背影》作者；地下逢一多，辛酸论话，应惆怅清华文坛”。2018年是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清华图书馆老馆举办了专题纪念展，展示了朱自清在1935-1936年担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时的历史性功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为保护馆藏珍贵中西文善本书籍的爱国爱校之举，至今让广大校友肃然起敬。2025年是朱自清先生任教清华100周年，朱自清先生五十载短暂人生中有24年是在清华度过的，他在清华开了16门课，影响了几代清华学子。如今，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大厅内安放有朱自清像，屹立于清华校园水木清华荷塘旁的“自清亭”与朱自清塑像，记载了他作为学者、教育家的一生，留下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